

DE LA

从投石索到无人机

战争推动历史

HONDA

A

La Guerra Como Motor
de la Historia

[西班牙]
胡安·卡洛斯·洛萨达·马尔瓦莱斯 / 著
Juan Carlos Losada Malvárez

宓田 / 译

LOS DRON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E LA HONDA A LOS
DRONES

从投石索到无人机
战争推动历史

La Guerra Como Motor de la Historia

[西班牙]
胡安·卡洛斯·洛萨达·马尔瓦莱斯·著

必田 /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9-257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投石索到无人机：战争推动历史 /（西）胡安·卡洛斯·洛萨达·马尔瓦莱斯著；宓田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10

书名原文：DE LA HONDA A LOS DRONES: La guerra como motor de la historia

ISBN 978-7-5203-4849-2

I. ①从… — II. ①胡… ②宓… III. ①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73618号

©de Juan Carlos Losada Malvárez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Rightol Media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 Email: copyright@rightol.com）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项目统筹	侯苗苗
责任编辑	侯苗苗 沈心
责任校对	李莉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10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35千字	
定价	59.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译者序 |

“War is all-father and all-king,
and he appoints some to be gods
and others to be men;
he made some to be slaves
and others to be free.”

——Heraclitus (公元前 500 年)

最初接到书稿时，看到题目便觉得有些忐忑。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历来战争不断；放眼当今世界，战争的阴云亦在一些地区经久不散。人们怀着沉痛与哀思记录下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将经历战争的切肤之痛印刻在民族最深沉的记忆中，世代传承。凡是对战争歌功颂德者，必然遭到和平主义者乃至大众的一致抨击。

战争虽然遭到人类的重重指责，但它却与人类的历史同样古老。自原始社会的早期，人们为了生存而狩猎，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进行部落间的征战；在人类文明的起始，不同的族群竞相逐鹿于两河流域，古希腊、罗马城邦间亦演绎了可歌可泣的战斗史诗；在中世纪，人们为不同的宗教信仰互相征伐，之后又驾驶航船，将欧亚大陆的战争扩张到美洲；火枪和大炮推倒了一座座中世纪城池，民族国家纷纷建立，战火愈来愈炽热，直到演化为全面战争；而在“总体和平”的当今世界，局部的冲突亦此起彼伏。既然武力现象客观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中，也存在于我们生存的当

下，那么如果抛开主观情感因素，它客观上又对人类造成了什么影响呢？

正如作者开篇所述，人们假如没有狩猎的需要，就不会发明投石索，而自从人们摆脱了臂力的束缚，掌握了这种利用离心力的投掷武器，并从就地取材进步到使用打磨石器后，人类的粮食便产生了富余，人口规模也不断增加。粮食的囤积和众多的人口需要有组织的管理，这不但促进了统治机构的组建和阶级的分层，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用文字记录仓储的需要，从而促进了数学和文字的发展。另一方面，粮食与文明成为令人艳羡的资源，持有者需要捍卫所得，而掠夺者需要在武力上取得优势，才能拥有更多财富。军事领导人应运而生，这不但进一步促进了社会阶级的形成，同时也要求人们不断地创新、不断地试验新的武器来进行防御与进攻。最终，战争的成败又决定了新格局的样貌。就这样，战争、武器和人类历史相互作用，这一辩证关系一直贯穿于人类文明的演变当中，到如今仍然保持着开放式的结局，并将伴随人类文明的发展，继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与其说作者通过这本书介绍了人类武器的发展史，不如说他通过人类武器的发展这一主线，深入浅出地整理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作者没有对人类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战争史实进行堆砌，而是有主有次，从更宏观的角度对具体的战役进行归类与概述。历史、战役不过是画面宏大的背景，而画面的中央总是各个时代

操持不同武器、面带不同表情、身着不同服饰的战争主体——人类。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种人文情怀，一种对人类发展沉静而深邃的审视与反思。

作者在书中不时添上几笔诙谐的色彩，如谈及斯巴达人的长发，拿破仑军队中军官的胡子，欧洲现代军队早期花里胡哨的制服，还有战争中人们俨如鼯鼠般的地道战，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让读者即使面对书中的刀锋火炮，也能够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随着作者幽默的视角，为人类自身莞尔一笑。作者这一严谨而不失幽默的风格一直伴随着我完成整部作品的翻译。

有译者形容翻译的过程是“带着镣铐跳舞”，也有人斥译者为“背叛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是顺着原文的篇章和句法结构，顾虑原文的风格，还是赋予自己更多文字上的自由、更大的施为空间？这一矛盾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忠实的文字转换员和具有独立创作意识的译者这两重身份一直进行着长期的博弈，而最终的产出也不过是两者的妥协，因此译稿成为了围绕着坐标轴中假想的“完美译稿”浮动的波形曲线。

这一曲线的极值可以体现在文法和词法上。在文法上，西语多是先总结后分析，而中文习惯先分析后总结；西语在段落起始和中间往往会添加许多连接词，而如果在中文中全部译出，则会显得累赘且不通顺；此外，西语惯用长句，而中文则多用短句。在这些方面，要感谢我的好友郑毓麟和宋磊凯，感谢他们不惜牺

牲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在百忙之中抽空阅读、修改译稿。他们良好的中文语感，总能帮助我及时调整曲线的波动。

在词法上的困难，主要是涉及专业术语的翻译。在查阅大量相关书籍来确定专业词汇的对应关系的同时，也不免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有些术语找不到已有的中文翻译，在这种情况下，和作者确认后，我多采用了意译的方式；还有一些西方武器传入中国后，经过改良，有了新的名字，这些地方需要仔细甄别。在这些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事交通学院的教员王小姣和天津市教育委员会的刘雅楠老师对文中的专业术语进行了逐一校对，为我纠正了不少错误，还为我提出了许多翻译上的修改意见。

原文洋洋洒洒三百页左右的篇幅，其翻译不免日复一日地伏案良久，坐穿板凳，但实是心之所喜，令人甘之如饴。在翻译过程中，我不断与文字背后的作者展开对话，吸收新的知识，开拓新的认知。每日的工作如同品尝一杯浓郁的咖啡，留在口中醇厚的质感沁入心脾，使人精神焕发。

最后再次感谢我的家人、朋友和各位兢兢业业审稿的编辑。在大家的合力之下，这部译作才能以更好的面貌问世。

宓田

2019年6月1日

南开大学·八里台

序

远古以来，战争便一直与人为伴。令人遗憾的是，它至今依然与人类如影随形。为此，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学家纷纷为其著书立说，如今西方一些重要的历史学家也将战争作为研究重心。这本书是在西班牙出版的第一部战争史大全。在此之前仅有的先例，也许就是马德里自治大学的费尔南多·克萨达·赛斯老师撰写的《冷兵器战争》，以及鄙人的《火器战争》。这两篇文章是米格尔·阿托拉主编的《欧洲史》一书中的两个章节。米格尔·阿托拉培养了几代历史学家，在 90 多岁高龄仍然著书立说，笔耕不辍，与本书作者胡安·卡洛斯·洛萨达在之后的引言部分所提及的那些著名学者截然不同。万望读者们不要因为急于阅读书本内容而错过了引言部分。

相反，我并不推荐阅读到此处的读者继续阅读这部分内容，而建议读者省省工夫，直接阅读本书正文，因为这无疑更加趣味盎然，也更富有启发意义。早有人说过，除了少许特例外，序言不过是放在书本最前页的无人问津之物，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

正如这本书的状况，序言作者的文笔不及正文作者妙笔生花，序言的内容也不及长篇著述富有魅力与趣味。

然而因为种种缘由，我无法拒绝胡安·卡洛斯·洛萨达请我帮他撰写此序的邀请。首要原因是我对他的认同与喜爱，对他人生历程的熟悉与欣赏。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纪念盖布里埃尔·卡尔博纳，他本应该挑起这份工作，那必然使我们都受益匪浅。第三个原因是我自身作为西班牙军事历史协会的推动者的责任意识，且本书作者从创会之初起一直与我携手并进，至今该协会已集结了上百位历史学家和未来的历史学家，他们都致力于开展军事史研究，使军事史研究能够获得与其在周边国家一样的欣欣向荣和卓著声名。

必须承认的是，我是在看到原稿以前就承诺作序的。正如上文提到的种种原因，我无法拒绝这份邀请。之后随着阅读的不断深入，我为自己有幸承担这份责任而欣喜，因为参与到如此独具匠心且内容丰富的工作中的机会实在不可多得。在历史编纂学中，这种规模的著作通常是经年积累、日久年深的成果，也是诸多研究项目整合的产物。此外，作者能够凭一己之力、一次性打磨和串联好所有必要的“瓷片”，以完成最终的马赛克作品，实在难能可贵。

假如您从未听闻过以下的内容，那么亲爱的读者，请您相信我的话语：洛萨达老师多年以来，孜孜不倦地为军事史的研究增

光添彩，并为它在学术界应有的地位而正名。为此，他不断在文献中贴注标签，不断购置和吸纳最新的参考书目。他如同一名模范海军陆战队员，总是向着老师——前面提到的盖布里埃尔·卡尔博纳先生——所指点的道路前行。他用简洁易懂又妙趣横生的方式在纸上描绘他的研究成果，他的书不仅能摘得学术的桂冠，还可以供读者在客厅的座灯下，或在地铁中阅读。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事件是证据确凿的，它们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历史常数。不幸的是，这类事件在近代并未减少，在当今世界也屡见不鲜，它们仍然是对社会的未来和许多人的个体生存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鉴于战争对社会和个体延续的重要影响，对它的研究古已有之，而人们对它的认识总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

从前，历史学家往往只聚焦于对具体战役和将领的主导作用的研究。如今，在约翰·基根和安东尼·比弗的倡议下，历史学家们开始关注战争真正的主角。他们收集战役中指挥官们和军队成员的个人轶事、经历和佐证，相比传统历史学家一贯的战争描述方式，他们用更饱含情感、更原生态和更写实的手法来记叙战争。这样的作品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畅销书，但如若不具备观察战争现象的整体视角，想要从一部只描述一场战役、一场军事行动乃至一次作战的作品中受益良多，恐怕难以实现。而这样的整体视角只能见于英国迈克尔·霍华德老师在《欧洲历史中的战争》中的记叙，此书的西班牙语版由一家名为“经济文化基金会”的

墨西哥出版社出版，几年以前便已绝版，至今未再有西班牙语版的再版。洛萨达的这部作品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此，我想与读者分享美国历史学家维克托·戴维斯·汉森的观点。他提到，尽管令人唏嘘，但了解战争现象最好的方式，往往就是研究其历史；而这一研究正是基于我们对战争事实的评估及对战争危害所形成的抽象认识。不过，汉森认为人类将永远与战争为伍，并将默默忍受战争带来的暴虐（《战争：一切之缘起》，马德里，图尔纳出版社，2011），这一点我无法苟同。确如汉森所认为的那样，战争与我们的文化紧密相关，但在一个世纪以前，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在极端崇尚武力的时期，宁愿不顾自身性命，也不盲从于那个时期的“爱国主义”激情。这点可从亚当·霍克希尔德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论述中窥得一二（《结束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分裂大不列颠》，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2011）。

最后，唯愿所有读到此处的读者能够同我一般，通过手中之书受益匪浅；也希望诸位能与我一样，在品读这本书时获得无限乐趣。

费尔南多·普埃利·德·拉维拉

退役陆军上将

古铁雷斯·梅利亚多将军大学学院教师（UNED）西班牙军事史协会副主席

马德里，2014年3月

| 引 言 |

▶▷ 军事史的“苦涩”正名

当我们穿越比利牛斯山脉，不禁会感到诧异：在法国的任何一个小城中，都矗立着一座军事博物馆，尽管这座博物馆或许十分简陋。事实上，在西欧的绝大多数国家，军队都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组织，但在西班牙并非如此。原因显而易见：佛朗哥主义及其内涵（西班牙军队对民主意志的政治干涉，及其所扮演的专制制度支柱的作用）足以解释军队为何在西班牙声名狼藉。然而，佛朗哥去世已近40年，军人涉政的威胁也早已在30年前消失殆尽了。自那以后，个别军人对民主生活非法干涉的言论已被驳斥，他们也受到了严惩。毋庸置疑，如今军队作为一个组织，早已成为民主制度的一大基石。另一方面，义务兵役^[1]早已消失了20年，民众都认为受到了它荒谬且无用的压迫，而当今的武装力量主要

[1] 卡洛斯三世于1770年创立了西班牙的义务兵役制，2001年宣布废除。如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被用于执行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并成为在火灾、洪水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中保护民众的先遣队。其结果是，无论从本质上，还是职能上，军队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早已与二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为何西班牙社会仍然对武装力量抱有一定的蔑视呢？为何仍然对其漠不关心，乃至将其视为仇敌呢？又为何这一负面的反军事主义观念仍未消除，尤其在某些自我定义为左翼的“知识分子圈”中呢？

答案是复杂而多元的，但是从一些扎根于文化圈和学术圈的宗派主义和偏见中，我们可以找到解答。这些观点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许多年以前，并且留下了难以根除的硬痂。在西班牙民主过渡时期，大学的历史系人满为患。人们对佛朗哥主义的终结都怀抱着幻想，天真地认为解决所有世界不公的方案——“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已在前方转角处。甚至对于绝大多数同学和我来说，正是舍己忘我和改革图新的理念，使我们选报了历史学，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历史学 and 经济学一样，是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的学科。在那样激越的年代，这是最重要的，而其他学科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二流学科。我们的目标是取得革命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培养的方式。我们欢欣鼓舞地期盼着尽可能多地吸收马克思主义，期盼着它可以为我们打开智慧的大门，使我们脱胎换骨，转变为能与切·格瓦拉比肩的新人。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是无用的，我们以少不更事的无畏，

指责它们是法西斯主义、反对派、大资本家或是吃人恶魔“三边委员会”^[1]的诡计。

绝大多数志趣相投且不甘于现状的老师们都让我们失望。我们激情昂扬地去听他们讲课，想着他们的理念有多激进，他们的教学质量就有多高。他们也满怀着政治憧憬，不停向我们阐述历史唯物主义。那时的学生与教师都有着相同的美好愿望：理解世界并改变世界。我们无须学习日期、人物、国王、战役、条款、传记、轶事！也无须学习数据，更无须像那些记忆达人一般麻木机械地死记硬背。那些全无用武之地，况且能在百科全书和手册中一览无余（另一方面，这种查询又是永无止境的）！在大学的第一个年头，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艰涩的、极其厚重的史学方法论相关的书籍，且偏好那些所谓的南美作家的作品。自然，我们那时什么都不理解，但为了保留颜面，在咖啡吧里（那时学院真正的“智慧”聚集之地，如今已然转移到了图书馆）谈论着这些书是如何令人赞叹、如何具有真知灼见。结论总是显而易见，并且总是一样的：唯一有效的理解方法是从教义手册中提取出的伪共产主义，它被称为是“科学”的，因此也是不容辩驳的，值得我们悉心钻研。

那时的我们懵懂懒惰，没有意识到那些我们所敬仰的真正伟

[1] “三边委员会”成立于1973年，由北美、西欧和日本三地区的政界、经济界的重要人物为主成立的国家组织。

大的历史学家，比如皮埃尔·比拉尔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他们完美的阐释和全面的总结都构架在对具体数据广博的认知基础上，而我们却自以为是地将这些数据束之高阁。我们以为，可以跳过这些可能“无用的”数据，来获得全面的理解。我们认为在史学中，唯一关键的是经济史，它能将人类领入共产主义天堂。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最重要的，尽管在此过程中会碰到繁杂而热烈的争论，涉及生产方式的数量、各种生产方式之间持续而令人费解的过渡、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结构等。

于是，我们每天仅上3个小时的课（！），在咖啡吧待着的时间比在教室中还多，发传单和参加会议的时间比看书的时间还长，我们学习了一年又一年，但仍对真实具体的历史一无所知。我们手头上只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和一些自我吹嘘可以清晰解读路易斯·阿尔蒂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而路易斯·阿尔蒂塞正是那位后来发了疯，掐死自己妻子的哲学家。我们的床头书都是阿尔蒂塞的学生玛尔塔·阿内克尔的厚重手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如同施礼华的祈祷书《道路》，这本手册能解决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所有疑问。我们全身心投入地阅读它，把它随身带着，在地铁和公车上骄傲地示众，不看时就放进制式背包里。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的一些人所谱写的战争史，而我们也应为自己书写的这部战争史做宣传。

就这样，在喧嚣热闹的虚空中，我们怀揣着资本主义因其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而行将崩溃的盲目信念，分析着如“小资产阶级”般的、时至今日仍然模棱两可的概念，手握着官方意义上合格的成绩，合用着实际上只是一个人完成、却有十人签署的小组作业，去参加考试、记录笔记，并在一些志同道合的老师们的帮助下，在学习了五年后，终于获得了现代史的本科学位（自然是唯一的一个革命性专业）。我们几乎从未学习过法国革命（因为在课程初期总有不断的罢工），也不知道哪位国王主导了1875年的西班牙王国复辟等，但是我们会谈资本的积累，工人阶级、女性和农民阶级艰苦的生活条件，社会动乱，“不平等兑换”，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等令人困惑的林林总总，也谈论一些新颖有趣的热点问题。但总而言之，也不过是利用进步主义者的名号来掩盖无知。那时时兴的专业是“口述史”“工业考古学”“区域史”“微历史”等，听着让人趣味盎然，但是就它们本身而言，各个自成体系，实际百无一用，甚至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欺诈。在这些新颖的史学观点的武装下，我们中许多人都自视为革新历史学的伟大学者，经济史和社会史改革的推动者。然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学生还是许多教师，都不懂教会史、宗教史、国家史、司法史、军队史等（归根结底，也是权力史），政治史甚至遭到蔑视。但我们实际上对国王、首相、法律、条款、战争、日期等都一无所知，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似乎学会了许

多解读历史和世界的视角，但是我们不曾了解、不曾拥有、也不曾掌握那些我们本当解读的数据！我们成了不具备知识储量的解读者！

那个时代早已逝去，这或好或坏。条件的变化发展早已让我们各司其职，而历史学如今则变成西班牙各所大学的“灰姑娘”专业之一。历史学正处于低谷期，对严谨及客观性的寻觅早已鲜见（即使客观性并不绝对存在，但人们仍应执着追寻），它们成为与之敌对的意识形态化的牺牲品。于是历史学家在媒体上大谈政治，而不谈历史。一部分曾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的教师改头换面，变成座谈会的席上客和报刊的人气撰稿人，以同等的热情捍卫那些本质上反动的理念（包括狭隘的民族主义），以此来博取支持和换取报酬。这是当下西班牙历史学研究的问题之一：过度的意识形态化和由此导致的宗派主义。因此，如今历史学成为投掷武器，人们用它互相指责、加深分歧，而非建设、理解或“搭桥”。更有甚者，认为这种不高尚的相互攻击自然而然且不可规避，毫无羞耻地声称在历史学家当中存在“左翼”和“右翼”，“民族主义”和“西班牙主义”之别。他们任意曲解历史，令其契合相应的政治信仰来避免丑闻。正如我们那个年代大学中的许多教师们所欠缺的一样，他们不再追寻严谨与客观性。这些理论家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宣传家，从几年乃至几十年以前就不再有所作为，而是继续坐享年轻时期作品的声名（假如在那段时期他们写